

法律，真的是有光芒的；
她的光源是公正与智慧。
头顶的星空有时会悄然感动人的心灵，
身边的法律日复一日地染化社会的精神。

舒 扬/著

星空下的法律

THE LAW UNDER THE SKY AND THE STAR

- 法治时空下的阳光政府
- 星空下的法律
- 自然法与理性法
- 跨越巅峰：法史学研究的学术定位
- 传承薪火：英美的法律教育
- 政体：平面铺开的社会法治
- 敏感的部位：法律边缘的政治组织
- 通过法律改良权力的品质

法律出版社



西南政法大学 学子学术文库

星空下的法律

THE LAW UNDER THE SKY AND THE STAR

舒 扬/著



法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星空下的法律/舒扬著.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9

(西南政法大学学子学术文库)

ISBN 7-5036-4443-5

I. 星… II. 舒… III. 法的理论—理论研究—中国—文集

IV. D920.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9272 号

法律出版社·中国

责任编辑/霍爱华

装帧设计/曹铀 胡欣

出版/法律出版社

编辑/法学学术出版中心

总发行/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莱芜市圣龙印务书刊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印制/张宇东

开本/A5

印张/15.125 字数/394 千

版本/2003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电话/010-63939796

网址/www.lawpress.com.cn

传真/010-63939622

法学学术出版中心/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100073)

电子邮件/xueshu@lawpress.com.cn

读者热线/010-63939630

传真/010-63939701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100073)

传真/010-63939777

中法图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客服热线/010-63939792

中法图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网址/www.chinalawbook.com

中法图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电子邮件/service@chinalawbook.com

中法图苏州公司/0512-65193110

书号:ISBN 7-5036-4443-5/D·4161

定价:32.00 元

总 序

西南政法大学建校至今已历 50 寒暑,中间虽遭遇“文革”之乱,停办近 10 年,但仍有 10 万之众的莘莘学子前后就学于此,歌乐山魂培育浩然正气,嘉陵江水滋养人文精神。10 万毕业生活跃于神州大地,为国家法治大厦之建设添砖加瓦,贡献才智,已形成法律界广受关注的西南法律人群体,造就了西南法律教育与这里的毕业生独特的品格与精神。

在校庆 50 周年到来之际,西南政法大学北京校友联谊会与法律出版社联合推出“西南政法大学学子学术文库”,这是对我们的母校 50 华诞的献礼,是对这所中国法律教育与学术研究重镇所取得成就的一次检阅,同时,我们也希望这 50 部著作能够成为后来者在法学研究和法律教育的道路上继续跋涉的阶梯,此外,还希望通过这些著作,能够向读者昭示西南政法大学的传统与精神。

体现在西南教育过程中以及学子著述里和行为上的品格与精神首先是强烈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生生不息的传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曾参的话最能够表现中国知识人的那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不过,近代以降,由于引进了西方的学术与教育制度,知识人有了不同的专业,因此在忧国济世与专业追求之间会有某种紧张关系。但是,对于一种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未曾存在过的新专业人士的法律人,他们与其他领域的人相比,在当今的中国注

定要遭遇更多的坎坷。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法律教育很快就处在受抑制的状态。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前期如西南政法学院等政法学院的成立与其说是对法律教育发展的起点,不如说是限制法律教育的举措。因为每一所政法学院都是在合并若干所综合性大学法律系的基础上而建立的;政法学院的出现其实大大缩小了中国法律教育的整体规模。比规模更重要的变化是,“政法”这样的概念所预示的法律教育内容与目标与既有传统的断裂。

因此,在政法学院里的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一开始就处在一种压抑的心态之中。我们看当时涉及法律教育的主流话语,完全是排斥法治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排斥愈演愈烈,终于导致法律教育的完全停滞。教师下放劳动,学校纷纷解散。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律界知识分子的忧患真正是刻骨铭心,难以排解。文革浩劫之后,法律教育虽然恢复,法治建设也逐渐提上日程,但是书本上法律理论与社会中的实际状况之间的巨大反差仍然是法律人经常面临的巨大痛苦。尽管位居西南,多少有些“处江湖之远”,但是由于专业的特殊性而加剧了的忧患意识却没有须臾少缓,甚至正因为与政治中心距离的遥远而更有所强化。

在法律教育以及法学研究方面,这种忧患意识与理性和开放的精神相结合,形成了西南法律人好学深思、平等讨论的尚智风气和不自盲从、不迷信的学术品格。尤其是复办后的一段时间,校园里面百家争鸣,学术墙报放言无忌,新论叠出,一些观点或论证,今天读来,或不免稚嫩,但是,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却颇有石破天惊之感。正是这样的校园风气,培育了西南法律人那可贵的怀疑和批判精神。

怀疑和批判不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而是建立在广阔而深邃的知识积累基础上的理性论证。最初,设置单科型政法学院的目标正是为了培养偏于技术化或工匠型的法科人员;不在一个综合性大学里,学生以及教师的知识视野就必然受到限制,批判精神便无从发育。然而,西南法律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意识到了这种教育体制的局限性,并且付出极大的努力,力求突破这样的局限性。图书馆里

的手不释卷,山荫道上的玄思妙想,宿舍卧谈中的唇枪舌剑,无不显示出这所专业略嫌单一的大学中的师生们不拘泥于法学一科、寻求超越的努力。这样的追求在我们的毕业生身上已经有多多样化的体现:除了那些从事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的人们经常在作品中显示出他们多学科的知识修养之外,不少校友进入政坛,或从事着法律之外的业务而且胜任愉快,一些人甚至成为戏剧作家、旅行(作)家、诗人、哲学家。相信随着母校向综合性大学的不断迈进,我们的毕业生在这个特色方面将更加令人瞩目。

对于人而言,50岁已经是“知天命”的年龄。但是,就大学而言,50岁只能说是世界大学之林中的一颗幼树。尽管我们的母校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精神和传统,在人才培养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还需要为建设一所伟大的大学而作出艰巨的努力。作为校友,在献礼的同时,我们也表达对母校美好前景的衷心祝福,祝愿母校的优良传统不断发扬光大,祝愿我们的校园永远桃李芬芳,祝愿我们的校友人才辈出,在不断提升母校地位的同时,也为整个国家法治大业的成就作出更多的贡献。

邈邈学府,在蜀山中。孜孜弘道,惟我学子。

《西南政法大学学子学术文库》编委会

2003年8月6日

自序——读书的年轮

谈到学术道路,我真无话可说,至于读书以及在读书中慢慢变老的事情,我就不能不有所吐露。

儿童少年时代,我是在四川北部一个贫困落后的乡镇里渡过的。我生来就吃着商品粮(或曰皇粮,这是城里人的绝对标志),身上裹挟着父辈传下来的爱书、恋书的原始的习性。我的父母解放初期(即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均在省城的大机关里做事,据说是为了响应什么号召,并比较体面地避让一些家庭负担(在省城家族人口太多,且有工资的家族成员极少),毅然下到最艰苦、最基层去工作的,除了带着未满周岁的我之外,还有一竹藤箱的书。我有没有细读过这些书,现在已无从考证,但我印象中这些书以政治类、历史类、医学类为多,即使我没有很好地消化这些书,至少它们是我读书生涯最初的一种环境、一种气氛,逐渐甚至会形成一种人生的原始气质。

我小时候读书还引出一段时间经常挨打。父母既是喜欢读书之人,为什么会在读书这个事上对我有打骂之举呢?

我小时候的空闲时间的确太多,因为我的生活里没有什么玩的可能和条件。父母整日整月地在乡间巡医看病,我常常独自守家,与我同龄的伙伴们要干农活,大家在一起玩耍的时间十分有限。记得当时我最憎恨的,就是人民公社生产队集体出工的钟声,钟声响过之后,整个镇上一片寂静,有时大白天的街头巷尾只有我和几条家狗在游荡,这种情形在今天说来大家都不会相信,而我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当时要能看到偶尔从田间挣脱绳索跑回来觅草料吃的水牯牛,

心里都会因觉得有趣而产生一阵狂喜。试问在这种无色无味、平淡得像置身于真空的年代，一个本性有求知欲望的少年儿童，不迷恋读书，他还能有滋有味地活下去吗？

由于读书，我出了一些痴狂的事。比如，多次模仿神话中的游侠，独自一人身无分文便离家出走，让家里人四乡寻找，甚至让公安局派出所立案侦查。看到书中描写的情节，禁不住以身试行，或从高处纵身跳下，或在湖底憋气不出，几次搞到死活不清的地步。看多了恶作剧的书籍，总想试一把，且试得都很成功，弄得乡里乡亲、上下左右、七姑八姨齐声大呼小叫，不绝于耳。这林林总总的事情被告发、被投诉，岂有不挨打受骂之理。

挨打最多的事情是借书引起的。小时候借阅面很广，忘性又大，很多书读后保管不善，借还不及时也就累积了书债。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本来与我无借阅关系，也跟着起哄，说我借了某某书，某某人作证，我因债主太多，凡遇这种情况，抵赖得很不坚决，所以使新债成为了事实。这下子可不得了，记得我在小学四、五年级这一时段最为苦恼和悲愤，那时，一到学校放学，我家的门口和窗前常有一大帮讨要还书的各式同学（后来个别家长也参与其中），他们齐齐高喊“舒扬！还书来！”的口号，形成了小镇上只有斗地主时才有的一种景观，围观者议论纷纷，我父母出面解释无效，那就只好将我从里屋揪出来，在众人面前怒骂拍打一通，方才能让索赔、请愿、围堵者散去。

我记得母亲每每为平息“众怒”打我时，都属于“假打真骂”，而有三、五次的打，是恨其不争的真打。我因多次见父母拿出工资一一赔偿我读书哺育出来的大小债主，心里产生了一种歪念。我一度更疯狂地借书，并将自认为的好书偷偷藏匿于一个大箱中，对外却说弄丢了。后来此事给家长发现，他们认为情况和性质都发生了变化，所以惩罚便来真的了。

我听我母亲讲，因为他们从省城来乡下，所以工资与当地比是很高的，我父亲很早就有县委书记一样高的工资，因此还引发了很多人

的嫉恨,搞得父亲长期很不痛快。他一次要拿出一个月的工资,了清在我家外聚众喊口号的人提出的书债,可见我闹得也实在是太过分了,做父母的不想打人都很难。

读书形成了我固定的生活,虽然早早地给我带来了内心的欢乐,但苦恼和郁闷也是挥之不去的。我在11岁上下的某一天,小伙伴大呼小叫地发现我黑发如织的小脑袋的顶部,有一根洁白发亮的头发在日照下闪烁,我在当年的日记中记下了这一天,从此揭开了我读书与白发共进的历史,也就是说书读得越多越杂,作为智慧象征的“少年白”就生长得越——“发展”。

在我少年到青年的过渡阶段,我读得最多的是毛泽东主席的著作,他的诗词、他的政论文、他的讲话以及后来他的最高指示,我都一一反复阅读和思考。我从来没有当过“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也没有刻意去写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但是坦白承认,我经常帮我母亲代笔写学习毛著的思想汇报,因为母亲单位抓政治学习很先进,好像每周都要求交1—2篇学习体会文章,而且要选好的出来贴在墙上,我母亲的体会文章经常都被张榜公布)。我13岁时开始在大报小刊上发表作品,但没有一篇的内容是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心得相涉的。

我如饥似渴的学习毛选(即毛泽东主席的著作选集)是有根源的。20世纪60年代末,我父母因在基层干得太久、太苦,组织上照顾他们进了县城的单位,我随迁成为县城居民。在一个安静平淡、古风淳厚的川中小县城里,我结识了几位当地奇特的人物。对我的读书生涯影响最深的,也正是他们几位。

一位是在1958年大跃进中全国闻名的农民作家,据说他写的那些大干快上、超英赶美的“顺口溜”曾被毛主席欣赏。此人是土得掉渣的“八代农人”,但十分爱读书因而有学问。在成名之后被县里调到文化馆当国家干部,因读书有知识而成功“跳农门”,他是远近闻名的一例,一时间成为家喻户晓的榜样。

农民作家是在一次中学生作文评比中发现了我的名字,此后我

在他寝室里面的时间比他老婆还多,是他经常给我讲毛主席的思想(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他对毛主席很有感情,但后来我发现很多思想和说法都是他自己的,他却大胆老脸的说是毛主席著作中讲的。有时他本人有些话还巧借鲁迅、茅盾、臧克家、孙犁、郭沫若、赵树理等人之口说出来,我就有些不以为然了)。农民作家很爱毛主席的书,他认为他看得懂、很亲切。后来农民作家患上了肝癌,临终前我去医院看他,他枕边还有一本毛主席的诗集。

另一位是据说犯了生活错误从省城银行下放来的银行职员,他家里比较多政治经济学一类的书,我和他接触,发现他瞧不起那些花儿草儿、雪夜情仇的文字。他认为真正值得一读的是理论书籍,正因为少人去读,你能读就说明你自己的高明,读书要追求高雅,什么是高雅呢?他给我的意思是:教科书、伟大人物的自传和著作,没有这些,经常可见到的人民日报社论也行。很遗憾,在我接受了他的启迪不久,我的这位读书民间导师突然自杀身亡了。

还有一位是做小贩的,此人很年轻,其父母在解放初期被土改工作队拉出去枪决了。他一直背着成分不好的负担,人虽然很健壮英武,但没有女性所爱,平日在祖屋的一个小角落摆了个烟摊。他是个乐天派,喜欢“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生活状态。在我印象中他的爱好是早晨在小河边练体操(主要是练单杠,为此他专门做了固定的单杠,我经常见到他在单杠上灵活地飞舞回旋,从内心很佩服他的毅力和体魄,他也很愿意与我在河畔无主题的交谈)。除了体操之外,他特别喜欢读外国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书,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领袖的全集和单行本他家里都有(他从不读中国领袖人物的书,他只给我提及过中国文人鲁迅)。我知道《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这些书名,全是他的功劳。他应该有很深的西方思想和文化背景,对从马克思到斯大林的思想研究是很自发的,也是很有民间水平的。他读书十分勤奋,从早到晚,手不释卷。反而守烟摊成了生活中的摆设。他曾在一次夜深人静的火盆边的长谈快结束时,眼含泪光

地对我说过一句话：“我父母被杀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我当时很费解，难道他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著作，就是为了对父母的暴死求解吗？到今天我回想当年此事，都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思。我只隐隐约约地知道，读书是在构筑他心灵的世界，一旦他拥有一个博大的书的世界，一切动机和目的都可以在此中生发和实现。

外国无产阶级领袖著作的精读者，本想让我成为他的知音和同路人。可惜，我当年涉世不深，而且文化底蕴清贫，虽读过几篇马列，但深感理解力跟不上去，尤其是西方化的长句型的行文说理，搞得人昏昏欲睡，没有良好的感觉也就没有了坚持的恒心。不过，我却能在读毛选中找到一种兴奋和自信，也能体会到一种欣赏的快意。

20世纪80年代初的暑期或寒假，我曾多次打探他的下落。有人告诉我，他已经不摆烟摊了，有一位乡下的大龄村姑坚定地爱上了他，他随之去了很偏远的农家，断绝了与所有城里人的联系。他出城时，带走的东西主要还是书籍，他珍藏的书主要还是马恩列斯的著作。现在的他，还在乡间纯净的空气下研读这些纸张发黄的经典吗？我端坐在电脑台前，心绪纷乱之中这样发问。

上述的三位人物都不是我学堂上的老师，但他们真正是我读书生涯中的导师。他们都没有什么庄严的学历，跟大学、高专没有丝毫联系，但是他们好像与生俱来的喜好读书，而且书读得很正，读出了点“神仙味”，他们是平民化的讲书人，像春雨润物细无声一样的，在文化与读书的洪荒年代影响着身边可以影响的人。因这类人的存在，我感觉到人类社会无论何时都是挺神奇的。尽管我有时描述了他们的灾难和有趣，但我在今天和将来继续读书，就是对他们最实际的尊重。

我在思想的启蒙年代，受一些平民读者的影响，爱读毛泽东主席写的书。之所以如此，还有一个客观原因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身边除了红宝书以外，再也不容易看到其他书籍。毛主席的书，真的是很丰富的精神食粮。即使是不再读其他作品，就我当时的精神文化需求而言，也已经足够了。毛主席书中的逻辑、语气、历

史、典故、诗情画意、人物事件、滔滔宏论、妙语连珠、指点江山、气吞山河、激扬文字、万紫千红……它要指引、教化、感染、征服一位求知的青少年，那还不是小菜一碟！我在思想和文化的巨人面前跪下了。我内心把毛主席神圣化了。毛主席的诗词、毛主席的故事和文章，的确在我青少年思想的养成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稍后一段时间，我的读书生活受到考高中（很奇怪，我生活的那个偏僻小县城，学生上高中竟要组织全县统考，而那时全国很多地方已经废除考试制度了）和考大学的影响，一度是备考式的读书，内容和篇目均受到严格限定，但这也是必要的，一定程度上使读书及读到的东西的结构趋于系统和完整。读书的有用论，除了在升学考试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外，生活中也不乏例证。高中毕业我下乡落户当农民，因为在生产队收工后抓紧空闲读几页书，竟被农民们高看许多、优待许多。农民们时不时帮我干活或给我派轻松活，让我有时间 and 精力去看书。但是农民们有一种固执，你在他们面前看报纸或者杂志，他注定认为这不是在用功，他们一定要你在翻读装订成一本一本的东西时，才认为你是在读书。耕读是农家本色，你在他身边耕种，又在他视野内读书，他绝对会断定你是一个很有出息的人，他便肯主动帮你。我的乡村读书生活就是这样的，我落户那个地方很穷，但自古以来有崇尚读书的风气，我下乡安家时带去了几个纸箱的书，这令村支书和农民们大喜，要求全村的男女娃儿都要向我学习。我干完农活后一般不会像其他知青一样还要自己生火煮饭，热情的左邻右舍轮番着替我操办家务，只要空闲下来能在院坝里给他们讲点书中的新奇事就行了。农民们特别喜欢听三类事情：一是因果报应的鬼神故事；一是杀富济贫的好汉故事；一是像福尔摩斯探案集那样的连环破案故事。我因善讲此类“评书”，农民爱我如宝，农闲之时天天晚上都围坐开讲，而且夜夜都有不知是谁家端来的油浸浸的一大碗挂面吃（我后来很排斥广东人中意的夜宵，恐怕与当年夜夜吃面有关）。

农民们脑袋里积存的记忆不多，所以他们听过的东西就记得很

牢实,我往外讲的东西太多,新的又接不上趟,难免有时要把一个完整的故事分成几个东西来讲,以拖长讲的时间,但好几次都给人家逮住。为避免短缺,我大量收罗可在民间流行的文字传说。可以这样下结论,我在当知青时期的读书,是消遣式的,是传播式的,是直接为人民服务的。

真正正规化、专业化的读书,始于大学时代。大学给了我全新的读书环境和读书氛围,大学里容易读到建设性、有用性、预见性很强的书。更重要的是,大学有专门为你准备的讲书的人,还有许许多多同你一样读书但可能比你更出色更精彩的人。一个喜好阅读的人,如果不去上大学,肯定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大学里的图书馆,那就是你的海洋,你随时可以去临海凭风,敞开心胸,接受洗礼。大学里的教师都是你的榜样,读书要读到他们那个份上,才可以有在大学从教的资格。在大学读书,是上了一个高台,是入了一种境界,那是厚积薄发的准备,是思想文化“高端”的强而有力的开始。

我在大学的读书岁月是这样拉开序幕的:

1978年的秋风中,我一身工装,踩着纷纷而下的落叶,在重庆市牛角沱区的一个新生接待站,找到了西南政法学院的红布横幅,首先接待我的是哪些工作人员已经记不起来了,因为我被一位先期到站的很文静、很修长、很白净、很漂亮、很洋气的女同学(我判断应该是)所吸引,可惜我其貌不扬,甚至身上还有工厂车间的机油味,她没有主动跟我说话,我也不好意思去问些什么,彼此都偷偷用眼角的余光交错的扫射。我心中暗暗生出一些喜意,改变着几天来的一种心情。因为在此之前,我始终对被西南政法学院录取为新生不满意,我父母对我考大学寄予很高的期望。有些文化的父母给我定的指标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即使不行,也应该去复旦大学新闻系,我自己也觉得应该有这个实力。我的一些朋友甚至认为政法学院不过是个“喊打喊杀”的学校,又跟臭名昭著的蒋家王朝的中美合作所相邻,实在算不上是个有文化品味的地方。老舍的名作《茶馆》里有个“二流子”角色就曾在舞台上摇身一变成了京城法政大学的学生,其

主要的“神气活现”就是到处耍横或充当打手,喜欢老舍作品的我,自然就因讨厌那个角色而顺带把政法学院给反感了。当怀疑这所学校的心理占据感觉主导时,发现竟有如此美妙的女子跟我是同学,我的心情顿时好了一半。

接着,到站的新生越来越多了,据观察,同学中有三多,一是帅哥多,二是讲普通话的人多,三是穿无领章帽徽的军装者多。这三多增强了我对学校的信心。因为,帅哥是体面和富家子弟的脸谱化,讲普通话说明学校有全国影响,四海之内报考者众;穿旧军装是当时政治上优越的外在标志,要么有军队的背景,要么是军中子弟,相比之下,我一介草根阶层的后裔还能亏到哪里去呢?想到这些,在西南政法学院新生接待站,我的心情在男女同学的“心理帮助”下,自行完全彻底的好了起来。

好像是七八辆军用大卡车拉我们进了校门,失望的情绪重新海潮般的涨起来。首先,那位美妙女子并非同学,可能是在城里搭顺风车返校的学校教工子弟,她爽朗的与司机的告别同时也把我的所有憧憬和预谋毁灭了。其次,眼前的西南政法学院,差不多就是一个破落的大宅院,道路泥泞,楼宇破旧,空间狭窄,建筑垃圾连片,美化、绿化的影子都没有。

同学们很不满意,而后很生气,在一些因素的诱导下,大家的怒火冲着四川外语学院燃烧。因为是它占据了本来属于我们的一大半的校园,而只有那部分校园,才有一种学校的幽静和文化上的美丽。很快,两个学校的正面冲突开始了,后来打了架,自然是一些爱穿旧军装的同学冲在前面。除了向外校争取现在看来根本就办不到的结果,同学们还给学校的管理层施加压力,比如学校基建、食堂、体育场地、黄土路、边陲堡坎、热水供应、教室降温、星期天的露天电影、澡堂的开放等等问题,同学们都以主人的姿态参与意见,批评乃至批判的吼声时起时落。我记得还有面对领导,学生代表严辞要求追究某某责任、严查某某工程账目的情况。

大家刚考入大学,新鲜感在鼓动一种浮躁,加上学习压力不大,

生存条件较差,大家的注意力大部分还不在读书上。我在入学第一年里是很轻松的,在读书上基本没有费什么劲,除了跟进课程以外,差不多就是信马由缰地在感受大学的各种人性化和生活化的细节,但仍然没有恋爱和去发现恋爱对象的欲望,连去打听新生接待站那位迷了我一下的女子是何家闺秀的打算,也在懒散中给忘却了。

一段时间的浮躁之后必是相对的冷静期、沉静期,冷静中读书求学的正道出现了。很明白的道理是,学生进学校不是来革命、来批判、来接管、来添乱的,同样也没有来改造、来建设的任务。学校是渡口的轮船,学生是船上的过客,在校几年能把学业修好就行了,关心那么多哆嗦事,真是何苦来着。于是,大家纷纷埋头用功读书了,没有任何号召,也没有什么激励措施,比学赶帮式的读书,夜以继日的读书像重庆的雾一样,静悄悄地覆盖了、蚀化了不大的校园。

我记得西南政法学院藏书很多,文革时学校虽停办,但图书资料被千方百计地保存下来。我们进校时的图书馆负责人叫夏登俊,他是一位儒雅的学者,俄文和英文都非常好。他作为一馆之长,经常在图书馆内上上下下的巡视,对任何一个进馆的学生都乐意给予帮助和指教。他曾不厌其烦地为学生查找书目,甚至讲解一些原版著作的意思,还放任我们到教师专用阅览室去挑挑选选,我就很得他的厚爱,常在他眼皮下溜进内刊保密室,将当时的许多保密材料和港台书籍一睹为快。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研室的各位老师都很有专业水准,当时的高主任、黎国智教授、杨永敬、刘永誉教授都是讲马列经典的高人。我记得听完黎国智教授讲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课程之后,全班同学都写了入党申请书。高主任解放前在重庆干过地下党,所以他讲的《共产党宣言》特别精彩。秦天云老师是位感情充沛的女性,讲到马、恩、列、斯、毛这些革命领袖逝世时,她都很动感情,有时还会在讲台上掉眼泪。我大学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姓赵,他辅导我读列宁的著作,那可是费老劲了,我的论文差不多最后就是他一字一句地跟我商量着写出来的,但他仍不满足,评定成绩时坚决地不给优秀,

使我很吃了一惊。

伍柳村教授的刑法课讲得极其斯文,像他本人的名字,廖俊常教授、徐静村教授的诉讼法讲得十分雄辩,而且大气磅礴,学生们私下称他们是“铁嘴”。有位教授在讲案例时经常冒出“龟儿子”、“狗日的”这类语气词,大家听得也很畅快。还有位被称之为“三朝元老”的教授,讲课时偶尔习惯性的把中国称为民国,把中共的市委说成市党部,大家不觉得奇怪反倒觉得很有历史韵味。张警教授是位饱学之士,他的浙江口音有时听起来比较吃力,但是他对学生从不讲半句废话,他喜欢板书,每堂课下来,他的兰卡其布衣服就布满了粉笔灰,加上他十分纤瘦,脚上老是一双解放牌胶鞋而且没穿袜子,看起来像个面粉厂仓库里忙碌的装卸工。张警教授嗜书如命,据说他真正的休息就是与自家的小猫下象棋。

张紫葛教授是个传奇人物,他说自己的眼睛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他给我们讲课大都是闭着双眼摇头晃脑地娓娓道来,在政法学院的所有很硬朗、很平直、很抽象、很逻辑的课程中间,突然听他讲庄子的《逍遥游》,那真有点随他飘飘欲仙的感觉。张紫葛教授看得起我,期末考试他曾给我98分,很破纪录的,但是我还是要说,当年除了对他和他的传奇人生、学识很尊敬外,我的确很怀疑他的视力问题,因为我发现他的板书写得很整齐,尤其是他还能一下子就辨认出这位女生是阿毛,那几个丫头是阿莉、阿菊、阿香、阿秀,至于男生,他只能像瞎子摸象一样,半天才叫出歪瓜、裂枣、狗剩来。

教我们辩证法的杨主任,据说在延安抗大时就同杨献珍共事,他好像是陕北人,讲话有点咬牙切齿的样子,讲到激动时满脸通红,我们很认真听他讲课,因为他书读得多,经验丰富,好多认识很深刻。有次听他讲课我正在盘算中午去食堂吃米饭好还是吃面食好,突然听到前几排的同学一阵带吃惊意思的爆笑。原来,杨主任讲话可能讲到需要震撼一下大家的时候,他的一口假牙脱口而出,越过了第一排女生的头顶,落在了三、四排座位之间,于是半个教室的同学紧急行动起来,为老师满地找牙。这时的杨主任好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不

好意思地用手捂住自己顷刻间变瘪了的嘴巴，等把牙找到之后，班里的学习委员很醒目的出来圆场，这节课就自动提前结束了。

林向荣教授会多种外语，日语尤其好，他长得又很像电影里面的日本国高官，难得见他一笑，我有点畏惧他。他做事待人十分严谨，对做学问要求极高。有次他带着我翻译一本英国的原版法律著作，遇到我出差错时，他瞪大眼睛又喊又叫的不依不饶。本来是他指导我翻译，有些章节基本上就是他自己在重译，译成之后，他坚持绝不署名。记得重庆的暑天气温达42度，人都要热得屁股冒烟了，但这位老先生每天中午两点过，就提前回到教学大楼等我上岗，我和他都不穿衣服，只穿裤衩，在走廊通风避光的地方干，我稍有懈怠，他就要用大蒲扇拍拍我的脑袋（当时连电风扇都没有）要我甩一下满头的大汗，继续用功。当时难受得真的想干脆死了算了。最后，人没死，书译成了，林向荣教授身上的东西也多少学到了一些。

讲法律逻辑的阳作洲教授很有名望，他学识很丰富，讲课时面部表情很严肃，有时作痛苦状，因为全班已从他的逻辑分析中知道了他想表明的意思，反倒是他在自己的逻辑里不知道怎么才能顺利的走出来，一时语塞，下面哄堂大笑，他却很认真地一脸茫然，好像万般无奈，长吁短叹一通，只好作罢。

高绍先教授是我们很喜欢的青年才俊，他高大威猛，相貌堂堂，走路和站姿始终都是端端正正的，他人很风趣，才华出众，讲课十分艺术。我记得当年他就很喜好穿浅米黄色的长裤，而且每次都熨得裤线笔直如刀刃，可见他面对学生，像很在意讲话的语言一样的很注意自己的穿着，难怪班里的女同学总要比男生欢迎他欢迎得更全面一些。后来不久，高老师一下子就当了校长，马上让我们悟到一种知识的力量。高老师当校长后我还有好多次跟他及其他教授一起在学校后山的铁路上散步（那时的娱乐好像就是晚饭后，在黄昏的灰光下遛遛约约地散步），散步时全无拘束地讲天讲地，免不了有一些插科打诨的玩笑和黄色幽默。记得刘永誉教授经常招呼高老师是水浒传里边的“高衙内”，闻者追去打打闹闹，彼此间毫无等级、架子可言，